

據不少媒體報導，中國政府因應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的壓力，正在醞釀全面廢除計劃生育政策。全面開放生育限制會否為中國社會迎來「嬰兒潮」？決策者在改革生育政策的同時，是否需要從教育、醫療、社會服務以至戶籍制度等方面進行深入檢討？敝刊計劃明年組織專輯，邀請海內外學者對此等問題作全方位探討，也歡迎各界賜稿參與討論。

——編者

「一帶一路」：美好願景，還是甜蜜陷阱？

當下中國外交戰略有兩個關鍵詞，一是「新型大國關係」，二是「一帶一路」。前者針對中美關係，展現了進入習近平時代，自信的中國試圖改革冷戰後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體系，為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建立新框架。後者雖然在地緣上包括西歐發達國家，但是更偏重亞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在內的、傳統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這裏集中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擁有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也是種族、宗教、政治矛盾交織的地區，中國將這一區域作為外交戰略的重要支點，也在情理之中。在過去的五年間，中國外交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道路並不順利，美國顯然不準備為接納崛起的中國而改變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在中美關係波詭雲譎之際，王賡武的〈絲路與歐亞舊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大陸的中心地位〉（《二十一世紀》2018年8月號）提出「一帶一路」可以協助中國避免「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因為「此倡議不是要挑戰原有大國，而是為了滿足地方和地區的需要，目前更要依靠參與其中的國家共同協作，結成夥伴」。但是，近來的中美外交博弈似乎並不支持上述觀點。剛剛離任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年初在德克薩斯大學發表演講，警告拉美國家「不需要新的帝國強權」，要格外小心中國的資本輸入。及至8月初，美國參議員致函美國現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指責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破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規則，用經濟手段攫取外交利益。在籠罩着敵意和猜忌的華盛頓，「一帶一路」非但未能減緩、反而加劇了中美關係從「互疑」到全面戰略競爭的轉型。

那麼「一帶一路」究竟是美好願景，還是甜蜜陷阱？這並非王文要解決的問題。他做了另一件更有意義的研究，即回到長時段的「絲路」（包括陸上與海上）歷史之中，探索孕育「一帶一路」戰略的四種歷史經驗與教訓。中國的「絲路」歷史

可以分為「官」、「民」兩路，前者集大成於明代鄭和下西洋，後者可以從盛唐時代的絲路交通以及南宋以降的海上貿易中獲得例證。但是，「鄭和式」的「絲路經驗」缺乏必要的戰略目的性，而單純的經濟動機和完全個體化的貿易活動也難以抵禦地緣政治風險。近代以來的西方殖民歷史提供了第三種「絲路經驗」，可是這種建立在征服與剝削基礎上的交往，已經不見容於二十一世紀。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外交是第四種嘗試，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亞非拉大團結」構成國際「反帝反殖」新戰線，但是改革開放的中國已經無法回到革命外交的老路。如何處理上述四種歷史經驗，將決定新時代「一帶一路」戰略的現實發展與未來影響。

馬釗 聖路易斯

2018.8.19

「水利大躍進」遺患未消

大躍進是新中國一段極為特殊的時期。一提到大躍進，人們多想到大煉鋼鐵、大辦公社；官史也把大躍進視為中共意在加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的一次不成功的嘗試。不少研究都忽視大躍進其實涉及到當時中國的多個角落，包括軍事和外交領域，1958年的台海危機和金門炮戰很難說與大躍進沒有關係；而大躍進對中國的影響也遠不止於大饑荒。

趙筱俠的〈「水利大躍進」的歷史考察——以江蘇省為例〉（《二十一世紀》2018年8月號）聚焦1950年代後期中國的農田水利建設運動，明確提出「水利大躍進」的概念，並分析了這場運動的起始、發展和後果。趙文指出，在粗暴的大興水利中，政府徵用土地，強制拆遷，使無數家庭傾家蕩產；而佔用的大量勞力和摧毀的土地又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是為大饑荒原因之一。

趙文思路清晰，既有大局眼光，也有實證個例，很有說服力，但讀後有些意猶未盡。這場運動的思想根源是甚麼？趙文簡單地歸咎於1950年代中期中共的極左思想，但筆者認為，根子在於中共缺乏對自然的敬畏。自建黨伊始，中共即有「人定勝天」的意識，延安時期大肆鼓勵開荒，在陝西、山西造成很大的水土破壞。建國後各級政府在應對黃河、淮河水災中的治理也錯誤頻出。中共對水利工程的認識局限於短期的防治旱澇和促進農業生產，缺乏對長期效用的考量，尤其忽略其對環境的影響。趙文在這方面的論述也比較粗略。

作者認為中共的水利建設相比大躍進其他工程，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具有合理性。但筆者認為，水利工程的遺患可能比其他工程更長久，也更難治理。相當一批半吊子項目改變了原有的水域結構和地方生

態，對當地民眾的衣食住行甚至地方政治，都有實質性的衝擊。例如，江蘇與山東就兩省交界的微山湖的歸屬權問題打官司打了幾十年，至今無解；而湖邊民眾自1960年代以來為爭湖田湖產連年械鬥，死傷逾千，這些都與大躍進時期倉促上馬的微山湖二級壩工程息息相關。

時至今日，大躍進被認為是國史上一段短暫的錯誤，人們篤信如此荒誕的悲劇不會再發生。然而趙文描述的一些看似荒唐的事件在中國一直悄悄地重複着。悲哉！

侯曉佳 加州
2018.8.18

延安陰影的又一個側面

陳永發的《延安的陰影》、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都是研究延安時期的私人撰寫的力作。正是私人性質的著述使作者能夠跳出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束縛，為讀者提供一種較為客觀的敘述。中共高層的明爭暗鬥無疑是研究延安時期的重要內容，但是延安的陰影也不僅僅止於權力鬥爭。陳永發的〈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紀》2018年8月號）一文通過對延安時期鴉片種植、製造、販賣的史實梳理，為我們提供延安陰影的另一個側面。

陳文理清三個問題：第一是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歷史背景，即1940年後國民黨對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和共產國際減少援助，中共作出此決定是為了解決當時的財政困難。第二是作者在佔有大量史料的情

況下，力圖說明毛澤東支持鴉片種植，並且毛的態度在中共內部關於此問題的爭論中得到強化。第三是討論了作為「塞北江南」的南泥灣也曾種植和販賣過鴉片。可以說中共在延安時期種植、製造、販賣鴉片是鐵的事實，儘管中共以「革命」需要為之辯護，但歷史不容抹殺，史學家更需要有秉筆直書的精神。

這篇文章的特色還在於對史料的搜集、運用和辨析上。陳文使用的史料相當豐富，並且注重運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手檔案資料。作者對史料的辨析相當用力，並通過對史料的辨析發現其背後潛在的邏輯。由於種植、販賣鴉片經常受到輿論的譴責，所以中共對此諱莫如深，在相關的文獻中盡量避免直接使用「鴉片」一詞，取而代之的是「特貨」、「土特產」、「肥皂」等詞。一般人很容易被弄得雲裏霧裏，但是它依然逃不過史家的慧眼。例如南漢宸強行沒收十三箱「肥皂」就可解決財政極為困窘的難題。作者對此提出質疑：如果沒收的真的是「肥皂」，怎麼能夠發揮如此巨大的財政作用？作者還進一步推理，南漢宸是有後台撐腰才敢如此「妄為」。文中類似的見解還有不少，不一一列舉。

延安作為「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值得研究的課題還較多，願後繼者能如陳永發一樣揭露出更多類似於「革命鴉片」的陰影，從而深化對延安時期的認知。

王琛 合肥
2018.8.13